

当代 西方文论 批判研究

张江◎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西方文论 批判研究

张江◎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西方文论批判研究 / 张江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 - 7 - 5161 - 8959 - 7

I. ①当… II. ①张… III. ①外国文学—
文学评论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813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茵 张 潜
责任校对 季 静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 × 960 1/16
印 张 35
字 数 361 千字
定 价 10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当代西方文论:问题和局限	(1)
第一章 向内转与悖离社会与生活	(27)
第一节 向内转的发生背景	(28)
一 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与发展	(28)
二 人文科学的语言学转向	(36)
三 现代心理学的发展	(41)
四 现实主义及模仿论的衰微	(44)
第二节 向内转的文学观念	(48)
一 非个人化的创作观念	(48)
二 张扬自指与内指的文学指称研究	(56)
三 文学游戏论的复兴与蜕变	(63)
四 文学隐喻研究	(68)
第三节 从向内转到向外转的演变趋势评析	(81)
一 文学形式革命性的认知	(81)
二 话语分析的兴盛	(88)
三 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的崛起	(96)
四 民族、种族、性别、生态等因素的介入	(100)

第二章 “自我中心主义”与文艺公共价值的消弭	(105)
第一节 从代神立言到自我表现	(107)
一 模仿论与真实世界	(108)
二 上帝之死与自我的确立	(115)
三 自我表现与审美自足	(125)
四 自我宣泄与欲望书写	(137)
第二节 自我的消解与重构	(149)
一 语言革命与主体消亡	(150)
二 自我表达与寓言象征	(159)
三 主体消亡与意识形态幻象	(169)
四 主体间性重构与和谐之美	(178)
第三章 现代西方文论的非理性转向	(190)
第一节 非理性主义思潮探源	(190)
一 什么是非理性主义?	(190)
二 非理性主义在现代思想中的全面掘进	(197)
三 非理性主义的理论困境	(206)
第二节 非理性主义文论评析	(213)
一 从再现到表现	(213)
二 从意识到无意识	(223)
三 从认知到生存	(236)
四 告别理性	(249)
第三节 非理性主义对文艺创作的影响	(262)
一 踏入混沌的生命之流:生命哲学与西方现代文学	(263)

二	探查幽暗的无意识世界:精神分析与西方 现代文学	(267)
三	直面生存之荒诞:存在主义与西方现代 文学	(273)
四	消解深度与意义:后现代主义与西方现代 文学	(277)
第四章 “形式崇拜”与内容和形式关系的倒置		(283)
第一节	形式主义文论的发展及其困境	(285)
第二节	形式主义文论的内在矛盾	(296)
一	符号构成:能指与所指的对立	(297)
二	文学研究法:差异与联系的对立	(308)
三	文本构成:形式与内容的对立	(314)
四	批评实践:描述与判断的对立	(324)
第三节	形式主义文论的理论局限	(331)
一	自足论:在文学与现实之间	(332)
二	目的论:形式的神秘化	(341)
三	还原论:悬置与抽取	(344)
四	工具理性的追求:唯科学主义	(347)
五	主体之死:反人文主义	(354)
六	无名无姓:反历史主义	(359)
七	纯与不纯:文学评判中的精英主义	(365)
八	“猜谜”与“解码”:文学教育中的神秘 主义	(367)

第五章 “反教化论”与审美追求的极端化误区 (370)

第一节 众声喧哗下的高度默契——审美

“反教化” (371)

一 对情感、直觉、意识、心理的过度倚重 (372)

二 对语言形式、文本细读、内部结构的
重视 (385)

第二节 开屏背后的羞赧——“反教化论”的诸种

弊端 (397)

一 脱离社会生活的审美乌托邦情结 (397)

二 缺乏辩证的机械性弊端 (404)

三 多元存在中的单一化固守 (408)

四 对“内容—形式”的割裂与颠覆 (415)

五 将文艺意识形态属性“幽灵化” (420)

六 去“价值关联”的乌托邦臆想 (425)

七 其所造成危害及其思考 (429)

第三节 脱缰之马犹马也：“反教化论”的教化

图谋 (435)

一 “反教化”的教化之维 (436)

二 “反教化论”产生的基础 (446)

第四节 教化——文艺创作的一种使命 (460)

一 中国文论中的“教化”思想 (460)

二 马克思主义文艺的“教化”观 (463)

三 社会主义文艺必须执守“教化”原则 (467)

第六章 精英主义取向与文学艺术的小众化危机	(473)
第一节 什么是“精英主义”	(473)
第二节 让文学艺术远离大众	(480)
一 20 世纪的文论转向与西方文论的精英化	(481)
二 没有大众的大众文化研究	(486)
三 没有日常生活的日常生活研究	(492)
第三节 为创作和接受设置“技术壁垒”	(498)
一 西方当代文论的科学化歧途	(500)
二 西方当代文论精英化迷失批判	(507)
第四节 西方精英主义文论的危害	(512)
一 当代西方文论的倒错与水土不服	(513)
二 中国文论的式微与迷失	(517)
三 西方当代文论在中国泛滥之原因	(521)
第五节 寻求中国文论发展的正确道路	(529)
一 如何看待中国古代文论	(531)
二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538)
三 处理好现有文论资源的正确途径	(546)
后记	(550)

导论 当代西方文论：问题和局限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当代西方文论热”在中国已经风行三十余年。三十年间，当代西方文论在中国获得极大推崇，俨然成为众多理论家、批评家顶礼膜拜的金科玉律。一些人，言必称欧美，张口德里达，闭口后现代。甚至一些西方文论中的非主流思潮，引介到国内后也被过度夸大，受到热捧。

在批评界，当代西方文论影响更为深远。翻检时下的批评文章，小到具体的概念、名词、术语，大到文艺批评切入的角度、阐释的方法、立论的逻辑，乃至文艺观念、文化立场、审美取向等，大多是西方的舶来品。中国批评家已经习惯于驾轻就熟地操持一整套西方话语，游刃有余地运用一系列西方评判标准。由此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一部作品好不好，中国自己的读者和观众没有发言权，中国的批评家说的也不算，而是要用西方的评判标准来衡量。中国文艺的话语权不在中国人的手中，而是掌握在西方理论家和批评家的手里。

应该说，新时期以来对当代西方文论的引进和推介，推动了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但是，总体上讲，当代西方文论是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孕育而出的产物。这一特殊的生

成语境，决定了当代西方文论带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文化特色，也决定了它自身无可避免的问题和无法超越的局限。长期以来，在盲目崇拜情绪冲击下，我们对此缺乏有效的辨析和清醒的认识。这对中国的文艺理论建设危害极大。基于这个考量，本书对当代西方文论的问题和局限做一些新的辨析。

一 “向内转”与悖离社会和生活

艺术来源于生活，现实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永远的根底和源泉。这是对文学艺术根本规律的揭示。文学艺术表达创作者的主观心理和意识，但归根结底，是客观世界和现实生活的反映。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社会分工和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文艺和生活的关系也变得更加隐秘和复杂，但是从根本上说，文艺与生活的源流关系不能混淆，现实生活和文艺的紧密联系无法割裂。在这一点上，对自律性、纯粹性和超验性的过度强调，导致当代西方文论不可避免地陷入理论误区。

从19世纪后期开始，西方知识分子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和绝望，纷纷从公共领域退守到专业一隅。与之相伴的，是他们治学理路的改变。以唯美主义为开端，西方理论家们将“为艺术而艺术”作为抗议和逃避现实的方式，主张文学艺术放弃反映社会生活，回归艺术本身；文艺理论研究，告别文艺与现实紧张关系的建构，内转到只关注文艺自身因素、内在问题。其理论实质和最终结果，是阻断文艺与生活的通道，将文学艺术“囚禁”起来，封闭在狭仄的小圈子内，沦为“杯中风暴”、圈内游戏，这直接导致了当代西方文艺悖离社会、悖离生活。

这一特征，在当代西方文论的两大主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代西方文论的发展，主潮之一是科学主义。哲学上的科学主义，思想基础主要是主观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具体到文艺研究领域，科学主义不再将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内容和对社会存在的反应，而视其为一个自足、自律的封闭体系。其要旨是只关注文学艺术内部要素、寻找内部规律，并极端到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的地步。

唯美主义、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等，均忠实地实践和鲜明地体现着科学主义的主张。唯美主义作为发端，率先强调审美自律、艺术至上，认为艺术不应该模仿现实，不应该表现时代。即便在某种情况下，艺术把生活作为一部分原料，也必须经过重新创造，使之成为新的优美的“与生活无涉”的形式。所谓重新创造，实质却是用虚拟的想象置换原本的真实，将现实生活从文学艺术中驱逐出去。及至俄国形式主义出现，文艺理论研究被彻底地桎梏在学科内部，对文学艺术发生根本性影响的现实生活因素，完全被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形式主义和在其影响下产生的诸多后续理论流派，譬如新批评派、结构主义，等等，以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支撑，将研究目光都紧紧锁定在文本上，在文本层面探寻形式、语言、语义、修辞等内部规律。

更为根本的是，这种内部研究，只是就形式谈形式、就语言谈语言，精心地过滤掉形式和语言在形成、发展和传播过程中所承载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仅就语言而论，语言本身就是社会的产物，语言功能的发挥，需要凭借建立在一定社会基础上的“意义公约”，语言的更转流变，更是以社会因素为根

本驱动。文学语言与日常生活语言在某些情况下会有所不同，但这绝不意味着文学语言可以脱离社会基础而独立存在。当代西方文论的语言学研究，无视文学语言的社会历史因素，片面夸大其特殊性，执着于用数理逻辑探寻音韵、词语和语句的组合构成规律。这种研究理路，在获取内部规律的同时，必然由于视野的狭仄而丧失更宏观、更根本的理论探析。

当代西方文论的另一主潮是人本主义。服膺在这一主潮之下的，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精神分析理论、直觉主义与意识流，等等。这些理论的共同之处和主要特征是把人作为理论研究的核心、出发点和归宿，通过对人本身的研究来探寻文学艺术的本质及其相关问题。

从方向上看，人本主义观念有其合理性。“文学即人学”，文学艺术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进行精神表达和精神追求的特殊方式，是一切艺术活动的主体。但可惜的是，在对人的根本界定上，人本主义滑入误区，抛弃了人的社会属性，使得位于其理论中心的人，要么成为悬置于客观现实之上的抽象物，要么沦落为全部由动物性欲望和神秘本能支配的存在。比如，象征主义认为，诗是象征、应和的产物。象征主义诗人视现实世界为可鄙的、不真实的，他们力图超越现实而进入超验的心灵世界和“内在生命的实体”。所谓“超验的心灵世界”和“内在生命的实体”，说到底，是脱离了现实土壤、与现实世界失去关联的虚无缥缈的存在，而不是现实中存在的人。表现主义也是如此。构成表现主义的核心概念是直觉。克罗齐主张，直觉不依赖于理智、知觉、感受和综合这些外在因素，直觉是

自在自为的，不受制于机械的、被动的事实。到了精神分析理论那里，以人为本的内涵，又变成了以单纯的人的生理属性，即性冲动为本。力比多驱动成为作家创作的最终动力。无论是“超验的心灵”“直觉”，还是“力比多”，都刻意剔除人的社会属性，使其简化到不与外界发生任何现实关联的纯然的人，造成对人的本质的偏离和片面性认识。其理论支点不仅是脆弱的，甚至是荒谬的。这就使主张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理论，并不是像有些人辩护的那样，经由对人的尊崇、挖掘和发现，切近了社会，切近了生活，而是从另一个极端疏离了现实，进一步扭曲、颠覆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

由此给文艺创作带来的不良后果，已经说明当代西方文论脱离社会与现实、主张文艺绝对自律、以隔绝的眼光关注文艺自身和对人错误地界定、从人本走向“非人”的治学理路是行不通的。

二 自我中心主义与文艺公共价值的消弭

百年来的当代西方文论史，是以文艺理论这一特殊方式，实践着西方价值观的核心理念，即对个体价值的推重和标榜。这一点，鲜明而充分地体现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各个方面。对个体价值的张扬，是统摄当代西方文论的中心，西方理论家不同流派的理论建构，只不过是围绕这一中心在不同维度上的展开。具体到创作理论，个体价值又被等同为自我价值，自我成为个体的代表。在文学艺术的表现对象这一关键问题上，当代西方文论“自我至上”的价值取向体现得尤为明显。表现自我、忠于自我、以自我为中心，成为当代西方创作理论的重要

特征。

在一些西方理论家看来，文学艺术的本质是自我表现，它本身并不承载为自我之外的大众代言的义务。精神分析理论把文艺创作的动因归结为自我宣泄。弗洛伊德认为，作家、艺术家从事创作是受他们“本能的欲望”驱使。他说，艺术家也和常人一样，由于欲望长期受到压抑而得不到满足，便以文学艺术的方式给予宣泄。文艺本质上是自我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表达。通过这种表达，使受压抑的欲望通过社会道德允许的途径或形式得到释放和满足。如此，表现自我就成为文艺创作的核心要求。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科林伍德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艺术表现情感，不是针对哪一类观众而发，而是首先指向表现者自己。换言之，艺术的天然职责，是忠于自我，而不是忠于他人。杜夫海纳也认为，文学创作，“它参照的主要是自己，而不是世界”^①。在当代西方作家和理论家们眼中，文艺创作的根本任务是呈现自我、释放自我，文艺没有为大众代言的义务，也没有必要去表现大众、服务大众。放弃自我，转投大众，是对艺术本身的背叛。只有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从自我出发，这样的艺术，才是真诚的、纯粹的艺术。正是在上述理念的驱动下，我们看到，西方20世纪的文学艺术，从观照的对象，到表现的情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群像消隐，个体凸显，“大我”撤退，“小我”出场，成为一个世纪的文学表征。

^① [法] 米·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韩树站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文艺创作离不开主体精神的映射。创作行为是一种个体化精神劳动。这种精神劳动的诱发因素，往往是对创作主体构成精神冲撞的个人感悟和体验。在创作过程中，任何创作素材，在被作家、艺术家选择、吸纳后，经过重新整合、塑形，最后以文艺作品的方式重新“输出”，不可能原生态再现，其中必然被打上创作主体的思想烙印。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作者在作品中投注的主观情感，对事物的立场判断，以及通过作品传递出的主体温度，是文艺作品精神价值的重要构成，是文艺家创作行为的重要价值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创作活动中，对创作主体自我地位的肯定和提升，不乏积极意义。

但是，这其中有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它直接决定着自我表现在文艺创作中的合理性。作为表现对象的自我进入作品后，实际上以两种方式存在。一种是“小我”的方式，即“我只是我”，不附带任何自我之外的其他元素。另一种是“大我”的方式，即这个自我，虽然也以个体的面目出场，但是，他的行动、思想、情感，甚至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具有非常丰富的社会内容。在这种情况下，自我代表的就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彰显的意义，可能直达一个群体、一个阶级，甚至整个民族、国家。而当代西方文论所倡导的，恰恰是表现“小我”。在20世纪的西方理论家看来，把个人强行融入集体是古代社会的特点，自主个人才是一个现代的观念或现代的建构。在对自主个人的表现中，独特性和独立性成为两个核心要素。其中，独特性追求的是自我的特立独行，“我是世界的唯一”，

自我的价值只有在与世界的差异中才能体现出来。这种理念追求，实质上是通过排斥自我之外的公共经验来成就与众不同的自我，使自我的价值得到凸显。独立性追求的则是把自我抽离出来，摆脱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群体的胶着状态，使之成为独立的个体。其立论逻辑是，只有自我充分独立，自我的价值才能得到彰显和尊重，融入群体、与群体合一，自我必然要受到遮蔽。这两个核心要素，决定了西方文论所倡导的自我，是与公共经验保持疏离状态，甚至对抗状态的关系。其实质，是无限膨胀的“小我”。

文艺创作如果只是满足于表现极端的“小我”，而不追求“大我”，这样的创作，严格来讲，不是文学，不是艺术。只有表达具有公约性意义的共同经验，让潜在的接受者能够在作品中看到自己的行动，体悟到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能够引起接受者强烈的认同和共鸣，才会激发阅读的冲动，接受行为才可能发生。这样的作品，才会在读者的理解和认同中得到流传，实现其价值。反之，迷恋于极端化的个人体验，叙一己事，表一己情，用自我代替一切，这样的创作，不会被接受。文学艺术成为文学艺术的前提，是被接受、被消费。这正如当年马克思所言，一条铁路如未通车、未被乘坐，它就不是铁路；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真正地成为衣服。这样表现极端自我的作品，由于未被接受，最终只是堆砌的符号、无意义的文本，在本质上与文艺无关。

从文艺社会学角度讲，作家、艺术家所从事的创作活动，是社会分工赋予的神圣职责，它先天地担负着为大众生产思想、

传递文明的使命。每一个人都有从事文艺创作的权利，也有通过文学艺术的方式记录生命、表现自我、抒情达意的自由。但是，一旦这种表达从自我的私密空间突破出来，超越了自娱自乐的范畴，进入公共传播领域，它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由自娱之物上升为公共精神产品，无可逃脱地要承担公共性的社会使命。具体到专门从事文艺创作的作家、艺术家，这种公共性要求必然更高。人类在社会发展中把作家、艺术家分离出来，给予物质保障和崇高荣誉，就是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在为全社会贡献智慧和力量。古往今来，正是由于作家、艺术家坚守了这一原则，文学艺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才得以确立，并不断得到巩固。放弃这种使命，把自我从大众中抽离出来，使文艺创作成为个体表达的宣泄工具，文学艺术将无可避免地走向消亡。

三 非理性主义与文学艺术的反智能化低俗化

非理性转向是西方文论在进入 20 世纪后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这次转向深刻地改变了当代西方文论的路径、形态和发展方向。其结果是，决定人类成长发展进步的理性主义日渐式微，基于生理本能的非理性主义取而代之，成为一种支配性逻辑和统治性话语。非理性主义片面夸大人类思维活动和文艺创作中非理性的意义和作用，把正常的、合理的非理性因素绝对化、极端化，并在此基础上步入反理性、反科学的误区，既扭曲了人类的本质，也难以达到对文艺本体的正确认识，更给文艺创作带来诸多消极影响。

非理性主义诞生的直接动因，来源于对西方传统理性主义